

【辽金元卷】

丛书主编 张燕瑾 赵敏俐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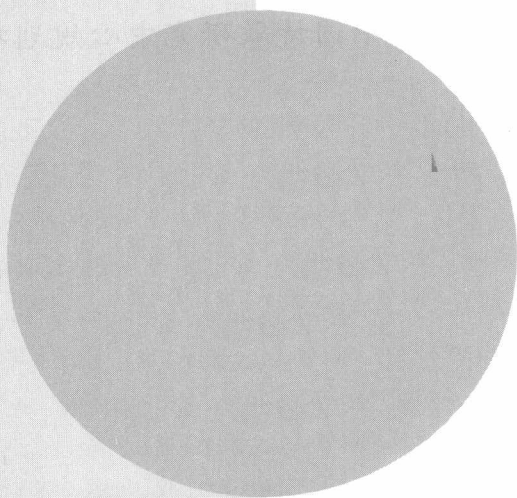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张燕瑾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CHINA)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辽金元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辽金元卷/张燕瑾, 赵敏俐丛书主编; 张燕瑾选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97-1166-8

I. ①2… II. ①张… ②赵…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辽金时代-文集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元代-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339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辽金元卷

丛书主编 / 张燕瑾 赵敏俐

选 编 / 张燕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薛 义 段景民

责任校对 / 孔 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春晓伟业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张 / 28.5

字 数 / 503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66-8

定 价 / 1680.00 元(共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张燕瑾

对于我来说，编选这部论文选是一个沉重的任务。要选择，就要有评价；要评价，就需要比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就应当有充裕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保证任务的完成。从时间方面说，最好是经历一段历史时间考验之后，再回过头来对这些学术现象进行审视，才能判断哪些成果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历久而弥新的，哪些则只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灭。傅璇琮先生说：“真正的历史评价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我相信，再过五十年，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期，那时来评价我们的二十世纪的学术历程，肯定会比我们现在站得高、看得全。”（《百年学科沉思录·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有充裕的时间也才能阅读浩如烟海的科研成果，视域开阔。没有遗漏、遍览所有文章可能难以做到，但少有遗漏应当是努力追求的目标。选择需要沉思，有一个能置身世外，摆脱各种人事纠纷和关系牢笼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才能做得公正、客观。这些要求又太过奢侈了。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学术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折应在“五四”时期。“中国学术一般认为有三个高潮。第一个是中国学术思想自己‘能动’（依王国维说）的结果，即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的时代。一个是宋朝道学（后来又叫理学）发生以至成熟的时代。造成这个新局面的主要是长达千年的印度佛教思潮冲击的结果，经过长期的共处、冲突、磨合，到宋朝才终于如王国维所言‘被中学所化’，至于为什么中学非要吸收佛学不可，除去社会政治等等原因而外，就学术本身讲，实由于佛学的抽象思维能力强于儒学，中国人如不能高攀而化之，实不能满足人类天性中要求不断提高抽象思维能力的天然要求。中国学术的第三个高潮始于清末与西方学术大规模接触之后。这个过程还没有完，也许竟没有‘完’的时候，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程度只能愈来愈广，愈来愈深，谁化谁？怎样化？都有待观察，更有待参与。……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因此而有二个清晰的‘界标’，这就是继上面提到的梁启超与严复诸先贤之后的‘五四’先贤为我们提出来的

‘民主’与‘科学’。科学思想是我们中国学术自从轴心时代就缺乏或者极不发达的，经清末的诸位先驱发现之后亟需补课的；民主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古以来没有的（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毕竟不是民主主义），然而它却是培养科学思想之所必需，因此两者缺一不可。自从清末逐渐酝酿，到‘五四’时期经陈独秀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与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的大声疾呼而成为不刊之论。从此以后，凡是朝这个大方向努力的，就是现代学术，与这个大方向相违背的，就不是现代学术。”（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此则学术发展之大观。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又是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关的。

20世纪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华帝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经受世界列强的侵略欺辱。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接踵而来的便是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年抗战刚刚取得胜利，接着又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其间，青年学生和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的现状，反对反动政府的卖国投降行径，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爱国运动，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洗礼，一次是经过“五四”运动西方民主、科学等思想传入中国，一次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尤其是后者，极大地改变着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精神面貌，不仅影响学术至为深远，而且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统一，民心振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却又接连不断地进行政治运动，其极端便是肆虐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的国家才进入了一个安定的历史新阶段。

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引起社会思潮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又引起学术观念、学术思想的变化。文学研究在这种变革、变化的冲击下经历着曲折，也在变化着，发展着，前进着。在时代大潮中起伏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从封建的、以感悟为基础的评点方式，向现代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型学术研究转化。其发展历程，学术界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19世纪初至20年代后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古代文学研究由旧向新转变的起始阶段。其贡献首先在于把文学研究从原来的文史哲不分、文体驳杂不拘的混杂状态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以前相比，一方面是研究对象范围缩小了，排除了非

文学作品；但同时又把研究范围扩大了，把原来被忽略、被排除在文学之外的民间文学、白话通俗文学纳入了研究视野。对文学性质的认识更深入了，文学是时代的产儿，应当从社会、从人生的角度来解读和评析文学作品。文学有开启民智民心、引导时代精神的作用。研究方法也从过去零敲碎打式的评点，发展为对整部作品的解析评论、对一代文学的宏观思考和对文学发展流变的系统研究，文学研究中“史”的意识出现了。文学研究不再是随感杂谈，而是迈入了科学的轨道，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了。

20 年代末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影响本时期文学研究的最主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向文学研究领域输入了唯物史观，使文学研究具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为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马克思主义逐渐普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指导思想。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展了接连不断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一方面促使学人努力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指导学术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同时，也造成了学术视角的单一化、思维方式的公式化，以及将文学现象政治化、作家作品阶级化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现象的发生乃至善泛化，对学术研究有着不利的影响。从总体来看，第三阶段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学术思维单一，故可谓之单向深入发展时期。

从 1978 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起，至 20 世纪终了为第四阶段。学术界对前一阶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极左思潮和种种谬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清理，出现了另外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学术理论多元化和学术风格多样化成为本阶段学术研究的新气象，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以上乃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发展历程之脉络，时贤论述已颇详赡，如赵敏俐、杨树增合著《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7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合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199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以参看，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辽金元文学研究大体与此同步。应当说明的是，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现代化、科学化的历程，首先是从托体近卑，一向不为学人所重的戏曲小说起步的。20 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也包含了戏曲革命在内，当时很多文章题为“小说”，文中却小说与戏曲作品并提、小说作家与戏曲作家并提，视戏曲文本为韵文体的小说，文体界定尚未厘清。

辽代文学作品存量少，成就不是很高，其研究成果我们选了顾敦铄的《辽文学》。文章提出了对辽文学的四点总体看法，辽文学的发展分期，指出了辽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也指出了辽文学中存在着“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因素。金代文学中成就最大的作家是元好问，我们选了两篇研究文章：郭绍虞的《元遗山论诗绝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研究；沈祖棻的《读〈遗山乐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行研究。

有元一代对文学的贡献是曲，早在元代就有人意识到了。虞集云：“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卷三）罗宗信云：“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周德清《中原音韵》罗序）元末明初人叶子奇也说：“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此乐府耳。”（《草木子·谈薮篇》）到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也说元曲诸家“咸富有才情，兼擅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屠隆说得更具有理论色彩：“诗之变随世递迁，天地有劫，沧桑有改，而况诗乎？善论诗者，政不必区区以古绳今，各求其致可也。”（《鸿苞》卷十七《论诗文》）这便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先驱。到王国维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文学发展，说得就更明确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但对于元曲，明清两代都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王国维指出了这种不合理状况：“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余甚惑焉。”（《宋元戏曲史·序》）只有当元曲进入王国维的艺术视野之后，才做到了“观其会通，窥其奥窔”。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学贯中西，哲学、教育、文学、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等所向皆精，开拓出很多学术领域。他由哲学进入文学殿堂，提出“境界”说，突出美学欣赏的领域。虽具体结论或有可商，但他充分体现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探讨的风

骨，却是十分令人敬佩的，这是很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他是近代罕见的学术全才，一代宗师。在戏曲研究方面，他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鬼簿余谈》、《古剧角色考》，1912年完成的《宋元戏曲考》（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则是他戏曲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巨著。陈寅恪评价王氏此作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是也……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氏学养深广，中西兼用，使戏曲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化学术轨道，“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我们选了他的《戏曲考原》和《宋元戏曲考》中的《元剧之文章》。在《戏曲考原》中，他提出了“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的著名论断，在《宋元戏曲考》里又提出了戏曲为“代言体”的概念，以代言体的语言、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对戏曲的本质特征作出概括。以此为标准进行衡量，那些只咏故事而无歌舞，或只演歌舞而无故事，以及非代言体的讲唱故事者，都不是戏曲。他在考察了戏曲发展的轨迹后认为：“尝考其变迁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不过因金元人音乐上之嗜好而日益发达耳。”虽然他的有些结论学术界至今还有不同意见，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他有些结论已不确切，但他对戏曲这个艺术门类进行探源性研究则具开拓之功，他对戏曲形成演进脉络的勾勒也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元剧之文章》则从有意境、自然、新语言三个方面论析了元杂剧的成就，这些结论一直为学界所遵循引用。《宋元戏曲考》不仅是戏曲研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成熟的标志。

较之王国维氏，吴梅治曲另有所长。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鹫，号霜厓，江苏长洲（今属苏州）人。治学于诗文词曲研究兼通，戏曲研究尤为专精。他的曲学研究侧重曲学知识体系的汇整和构建，是20世纪曲学另一家。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云：“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研究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吴氏《南北戏曲概言》纵论元明清三代之戏曲流派，颇中肯綮，在吴氏著作中，是理论色彩比较浓的一种。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笔名西谛、

CT、郭源新等，是20世纪的文艺多面手，集创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文献学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于一身，且中西兼通，而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研究贡献尤大，由他创意并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是学科建设上功德无量的盛事。他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留波夫等的理论著作，故其研究颇能深入。入选的两篇文章都是分析元杂剧重要题材类型的，就很能体现他的社会学功底。

凌景埏的《南戏与北剧之交化》是从南北戏曲交流融合角度立言的。

20世纪对“八仙”研究贡献最大的，当属浦江清之《八仙考》（1936年，现收录于《浦江清文录》），详细考证了八仙的来源，而对元杂剧中八仙形象、不同的八仙组合、八仙戏的演出形态进行详细研究的，则是石兆原的《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一文，这不仅是研究元代神仙道化戏的重要成果，也是研究八仙的重要成果。结合《蓝采和》一剧，石兆原氏还分析了当时剧院、伶人、剧团、演出、剧本、观众等情况，纠正了一些王国维氏的失误，是很有价值的。

在研究元代大文化背景方面，我们收录了陈垣、周祖谟两位先生的著作。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是著名史学家，对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元朝史注意最多。陈氏以严密的考据著称。他的考据不以一事一物为目标，而是要解决一个时代的大问题，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故其文宏阔大气，又充溢着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元西域人华化考》即是一例。“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陈垣致友人书）文中论述了元代西域人“百年之间，作者三十余人，著述至八十余种……且皆华法，非西法，与徒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不同”（《结论》），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颂扬，也是对元代文化总体风貌的准确把握，突出了元代文化的特色。陈寅恪在《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微（按，钱大昕）以来未之有也。……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晰，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可见论文之价值意义，超乎所论本身。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方法上看，均超迈前人，被蔡元培氏称为“石破天惊”之

作。我们选录了其中的“文学篇”和“结论”两部分，足见元代对儒人和文学的政策及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西域人华化情况。元代崇尚文儒的政策造就了元代文化的繁荣。持论与否定元代文化者大不相同。

周祖谟（1914~1995），北京人，著名语言学家。但其《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却是一篇研究元代文化背景的力作。文中所举多为诗文作家，对他们出仕原因、出仕心态的分析，颇为具体，实际是对元代文人心态研究的早期尝试，对我们了解元代社会、了解元代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都是很有帮助的，对后世文人心态研究也具有启发作用。

王季思（1906~1996）名起，字季思，浙江温州人，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词曲研究尤为突出，20世纪中期之后，更成为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对王实甫《西厢记》从作者、注释到论析的全面研究。我们选了他的《〈西厢记〉叙说》，谈了题材衍变、作者、剧中人物、王实甫的贡献等等，体现了王氏对《西厢记》的全面看法，是关于《西厢记》研究的权威性著作。《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也是一篇力作，从作品的思想倾向、人物描写、语言运用等各个方面考察和分析戏曲史上的风格流派，没有全面、深厚的学术造诣是难以做到的，其观点至今为元杂剧研究者所称引。

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笔名淦女士。冯氏创作与学术兼擅，是戏曲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其《南戏拾遗》、《古剧说汇》、《古优解》都是学术史上很有影响的著作。《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以王实甫的散曲套数[双调集贤宾·退隐]为中心，联系《录鬼簿》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及孙楷第、陈寅恪、王季思等人的意见，为声誉显赫而身世寂寞的王实甫，画出了生平轮廓。

在关汉卿研究方面，胡适的《读曲小记（一）》是最早提出关汉卿不是金瓶说的，在关汉卿生活时代的考订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李健吾《从性格上出戏兼及关汉卿创造的理想性格》，从创作论的角度展开论析，通过中西对比，全面论述了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不仅在当时是很有深度的见解，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戴不凡《关汉卿笔下女性性格的特征》是以分析人物形象见功力的论文。

任讷（1897~1991）字中敏，号二北，晚署半塘，江苏扬州人，是取得了多方面学术成就的曲学专家，最卓越的学术贡献在于使散曲研究从词学研究戏曲研究的从属地位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散曲学。他的著名学术论文《散曲之研究》便是散曲学研究学科独立的标志。任氏对散曲、小令、套数等基本概念和术语作了科学的界定，至今为学界所依遵；他使散曲研究脱离了零

碎、随意的评点式旧曲学思维方式，构建了新的有系统性的曲学研究框架；任氏受业于吴梅，吴门师法，词曲兼修，任氏运用比较法，通过词曲比较，论证了散曲的特质，评论了散曲的流派。吴梅在为任氏《散曲丛刊》作的叙中说：“今曲苑蹊径，茅塞已久，中敏一为芟荆，得成康庄，俾方车驷马，憧憧往来，不亦可大快耶？”对任氏于散曲研究之贡献，做了准确的评价。

依本书体，只以结集形式出版，没有以论文形式单独发表的作品，不在收录之列。但考虑到文章的具体情况，经研究，也有少量破例。

郭沫若是诗人、戏剧家和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本不在文学研究方面，但其《〈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通过评论《西厢记》，体现了“五四”时期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推崇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他是用“五四”时期的时代眼光来解读《西厢记》的，也是运用性心理学解读《西厢记》的。他认为文艺作品是文艺家个人精神之表现，产生于个人内心的自然冲动。文章忽略了时代的影响，一些结论还不够冷静和科学，但他对元曲总体精神的判断和把握，却不无参考价值，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则不失为经典之论。文章最初发表于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新式标点本《西厢》，是作者为所改编的该书作的序引，后收入其《文艺论集》，我们也收录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两次牵动全国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学术大讨论，这就是1956年对古典名剧《琵琶记》的讨论，和1958年纪念关汉卿戏剧活动750年及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所进行的对关汉卿的研讨活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刚刚推出，学术研究还没有像后来的“评《红楼梦》”（评红）、“评《水浒》”那样假学术之名进行政治运动，人们踊跃发言，热烈争辩，进行得轰轰烈烈。尤其是《琵琶记》的讨论，肯定派与否定派针锋相对，论争激烈。学术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经学，也不同于词曲之学，人物形象的分析成为文学作品的新的解读方式。关于关汉卿研究的文章，我们选录了李健吾、戴不凡的两篇文章，已如前述。关于《琵琶记》研究，我们选录了董每戡的《〈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的《〈琵琶记〉讨论集》）、戴不凡的《赵五娘的悲剧》（载《剧本月刊》1956年10月号）。不久，他们又做了增补加工，董文成了董著《琵琶记简说》（1957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的一部分，戴文则成了戴著《论古典名剧琵琶记》（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力图从“戏”的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反握剧作题旨。这两部书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可以说，作为肯定派的中坚人物，他们的意见起了明星作用。董

每戡（1907~1980），浙江温州人。董先生不仅是一位学兼中西的学者，也是剧作家和导演，著作宏富。不幸的是，1957年夏天，应某领导之邀，在一次整风的座谈会上发言，因言得祸，被定为“极右分子”，被打翻在地。董先生深谙戏剧三昧，且中西戏剧理论素养深厚，其戏曲研究，不仅看重文学性，更看重“演剧性”、“舞台的品性”，往往从戏剧矛盾冲突中解析人物，领悟作品，这是他不同于文学史家、词曲史家的地方。考虑到董、戴的文章与著作相隔不久，而著作更成熟，影响更广泛，在论文选中，我们便节录了他们著作中的相关片段，以代论文。

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时代的产儿，都带有时代的胎记。不仅论文中有些观点和提法大可商榷，其治学方法、思维方式，也并不都是今天的学术界所完全认同的。但这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所走过的脚步，所留下的足迹。这就是历史。

有一些论文体例杂乱，这可能是新式标点始行，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规范，掌握不够熟练的缘故，我们怕有违原意，也未作大的改动。

依本书编选体例，不收健在作者的文章。第四期卓有建树的学者多在壮盛之年，其论文不在入选入列；第三期不少有成就的学者，身体依然健旺，其论文也不收录。这些学者不仅对学术做出了卓越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他们的健康长寿是学界幸事，是推动未来学术发展繁荣的宝贵财富。这是本书论文未按分期比例收录的原因。

以上是遴选论文因由之大要。

按本丛书体例规定，辽金元卷字数宜少于其他各卷。元代享国不永，其文学积累不丰；有元“一代之文学”为曲，而曲又素不为传统学问所重，王国维氏早已指出，散佚严重，研究者希。虽20世纪以来渐有改观，但毕竟缺少诗、词、散文等正统文学深厚的学术底蕴，给辽金元卷少一些篇幅是适宜的。

所收论文，以辽、金、元时代为序排列；每一时代，又以综论、文体及作家作品为序；同类论文则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本书虽是选录他人之论文，但既云“选”，便需要眼光见地。固然，各有所好，不同人意见总不会完全一致，不过对于学术著作来说，还是应当有大体一致的价值判断标准的。也正因如此，才深感惴惴，诚恐或因闻见不广，或因眼光短浅而导致遗珠之憾。是耶？非耶？也只好就教于方家大德了。

论文排出后，我的硕士生葛百睿君费了很多时间进行校对，在此深致谢意。

2004年立冬之日

目 录



前言 (张燕瑾)	/ 1
辽文学 (顾敦铎)	/ 1
元遗山论诗绝句 (郭绍虞)	/ 25
读《遗山乐府》 (沈祖棻)	/ 36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	/ 43
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 (周祖谟)	/ 71
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 (石兆原)	/ 90
元杂剧及其时代 (朱东润)	/ 116
戏曲考原 (王国维)	/ 141
元剧之文章 (王国维)	/ 157
南北戏曲概言 (吴梅)	/ 162
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 (郑振铎)	/ 169
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 (郑振铎)	/ 186
宋金元戏剧搬演考 (钱南扬)	/ 202
南戏与北剧之交化 (凌景埏)	/ 212
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 (周贻白)	/ 234
侯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 (周贻白)	/ 239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王季思)	/ 244
读曲小记 (一) (胡适)	/ 267
再谈关汉卿的年代 (胡适)	/ 272

从性格上出戏兼及关汉卿创造的理想性格（李健吾） / 275

关汉卿笔下妇女性格的特征（戴不凡） / 284

《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郭沫若） / 311

《西厢记》叙说（王季思） / 316

王实甫生平的探索（冯沅君） / 330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董每戡） / 338

赵五娘的悲剧（戴不凡） / 350

散曲之研究（任二北） / 364

词话考（孙楷第） / 431

辽文学

顾敦録

一 历史的背景

辽就是契丹。契丹是其本名，有钢铁或刀剑之意。辽是契丹与汉文化接触之后改用的名号，是因水得名的。本文所讲，大体是契丹称辽以后的汉文学，故称辽文学。契丹称辽，始于太宗之时。会同十年（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九四七年。按《二十史朔闰表》作丁未晋少帝开运四年，误。契丹于开运三年十二月已灭晋，故今从《辽史纪事本末纪年表》。黄任恒《辽痕五种》《辽代年表》亦同。）正月，太宗法驾入汴；二月，建号大辽，改元大同。以后虽圣宗又一度改号契丹，但因：（一）辽为汉化的名号，（二）道宗以后仍复号为辽，（三）辽亦有汉族的文人，（四）又专论汉字的文学，故不称契丹文学，或契丹的汉文学，而以概称辽文学为宜。

辽以前的历史，《周书·文帝本纪》说：“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卷一）《辽史·地理志》又说：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卷三十七，《孝安县》）

这些自然都是神话。远古难考，且与文学无关，姑存而不论可也。

其实，“契丹本东胡种”。（《新唐书》卷二一九。按他书称契丹为东夷，误。盖东夷，或鲜卑，或契丹，为一族，属北狄种。肃慎，或女真，或满族，又另为一族，属东夷种。二者区别至明，不可相混。）后来的变化，《辽史·世表》说：“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卷六三）再以后，乃为宇文氏。《周书·文帝本纪》说：

其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众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组；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字，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邨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卷一）

至是，遂称契丹。《辽史·世表》说：

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卷六十三）。

宇文氏之败，在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三四四年）越五十余年至元魏时，始以契丹之名著于中国。这时契丹已渐蕃盛，居于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分为八部。八部之外，又有“皇族”“国舅”二族。历来，皇族是大贺氏，遥辇氏，世里氏，代表乘白马的神人，是为三耶律。国舅是乙室已氏，拔里氏，代表乘青牛的天女，是为二审密，后称萧氏。到唐太宗时，契丹酋长大贺窟哥内附。太宗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即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武后时叛，败亡，遂中衰。玄宗时，遥辇氏代之，亦不振。到唐衰，世理氏的耶律阿保机崛起，统领诸部，国势复兴，遂与唐宣告独立。到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机便代遥辇氏而立，建元神册，是为太祖。

太祖立，尽服塞外诸部落。北征室韦，女真；西降回纥，吐谷浑，党项；东灭渤海；又令吐蕃新罗入贡。接着太宗再援石晋而灭后唐，遂收燕云十六州。于是契丹疆域，“东至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南至白沟”，（《辽史·地理志》，卷三七）蔚为北方一个大国。

历世宗穆宗而至景宗，正是宋太宗的时候。这时宋太宗已灭北汉、辽，宋缓冲地带既撤，两国遂起直接的冲突。高粱河之役，契丹大破宋军，进围真宗于瓦桥关。以后，契丹屡扰河北各地，对宋压迫了二十多年。圣宗时，耶律休哥专任南边事，又大破宋将曹彬于岐沟关，并盛服高句丽和女真。不久，圣宗与萧太后又亲将侵宋，直到澶州，屈宋君纳岁币，声势益盛。圣宗之子兴宗，亦克守先世遗业。到道宗时，重新与宋议定疆界，获新地七百余里，国威愈振。

但是道宗的后半期，信用佞臣耶律乙辛，自杀其子耶鲁斡，忠良多遭陷

害，羁属亦生贰心，国运渐趋倾危。其孙天祚帝立，荒于游畋，国政更坏。这时，辽年年遣使到女真去求名鹰“海东青”，骚扰得很利害。金不堪其扰，复因辽纳其逃人，遂于天庆四年，（宋徽宗正和四年，公元一一一四年）举兵攻辽，陷宁江州和咸州。进据黄龙府。天祚帝自将大军征金，到驼门，闻部下有欲立其弟淳者，惶遽还军，为金人所追败。第二年，金人取辽东京。议和久不成，保大元年，（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战端复起。金人克辽上京。又以辽降将为向导，克中京、西京。金又入居庸关助宋，破辽南京。天祚帝转辗漠南，到保大五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卒为金人所获。辽建国至是，凡九代，二百十年而亡。

二 文学启蒙期

辽的国祚既这样的短，而其势力又没有像金元那样的深入中国，所以向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对于她的文学，大多不很注意。道地一些的，也不过把辽史文学传的序直抄一下，或稍加增损，便算好了。《辽史·文学传序》怎么说？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赳赳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以搜狩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辽史》卷一百三，《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上》）

所谓“数君子”，只萧韩家奴，李浣，王鼎，耶律昭，刘辉，耶律孟简，及耶律谷欲，寥寥七人而已。其不能在文学史占一地位，自无足怪。但仔细一考，却又不然。辽文学家实在不只上述的几个人，而且他们的文学，也很有一些是斐然可观的。兹就辽文学自然的展演，分三期讲来。

契丹文学在太祖太宗的时候，是一个胚胎时期。其初，本来是一个很野蛮的民族。自唐中叶以后，才渐进文明。太祖的祖玄祖才教民稼穡，太祖的父德祖才知道冶铁，太祖的叔述澜才教民耕织及建筑城邑。到太祖阿保机的时候，因与汉族密接既久，才不知不觉的中国化起来。当时自然讲不到文学，但民间的歌谣是已经有了。如“青牛姬，会避路”。（《辽史》卷七十一，《列传》第一，《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就是一例。契丹谚谓地祇为青牛姬，这个童谣